

ZHONGHUA QIANBI LUNCONG



中華錢幣論叢

馬飛海 主編

上海書店出版社

中華錢幣論叢

第一輯

主編	馬飛海
副主編	王裕巽
	林國華

上海書店出版社

中華錢幣論叢(第一輯) 馬飛海 主 編

出版 上海書店出版社(上海福州路 424 號)
發行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印刷 上海工業大學印刷廠
開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數 250 千字
印張 10 印張
版次 1996 年 8 月第一版 1996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0001-2000
書號 ISBN7-80622-126-3/K·11
定價 28 圓

編者的話

10年來，中國錢幣學研究欣欣向榮，蓬勃發展。隨着學術活動的日益豐富多采，有關專著和論文稿源多而能發表者少的矛盾逐漸突出，特別是長篇專論更難找到發表的園地。《中華錢幣論叢》以堅持“雙百”方針，團結國內外學者，繁榮中國錢幣學為宗旨，為錢幣學文章包括一些篇幅較長的專論，提供發表機會。

《論叢》的內容：（一）論文，包括專論、綜論、總結、學術報告、考證答辯、讀書札記和資料性文稿等；（二）《中國歷代貨幣大系》各卷所約的部分文稿，并投稿中確有價值的文稿和資料；（三）學術上互相探討和爭論的文章等；（四）中國錢幣學史史料和考證等；（五）古今錢幣學家傳略和論著評介；（六）學術性、考證性并兼具興趣性的短小精悍的文章；（七）選登、摘登已發表的有關中國錢幣學的中外重要文章，及時介紹新觀點、新資料；（八）其他有關錢幣學的文章。

本《論叢》提倡文章言之有物，言之有據，言之有理。在此基礎上，開闢新思路，提出新觀點，闡明新思想，貴在有科學的論證，有啓發和指導的作用，通過進一步討論或爭鳴，使論述更符合客觀真理，有助於推進學術研究的深入開展。

歡迎致力於錢幣學研究的專家、學者和廣大錢幣收藏者不吝賜教，共同把《論叢》辦好。

《中華錢幣論叢》編輯部

1994年11月

目 錄

編者的話

一個勇于開拓中國錢幣學新局面的學者

——紀念彭信威先生和《中國貨幣史》

出版 40 周年	馬飛海(1)
建議成立中國集錢文化宣傳監督委員會	朱 活(9)
齊魯貨幣考	朱 活(11)
居延漢簡貨幣資料研究	王廷洽(27)
西漢長沙國出土貨幣研究	周世榮(54)
西漢金屬貨幣研究——兼黃金非貨幣論	王裕巽(133)
元明農民起義軍鑄造的錢幣	唐石父 趙繼明(156)
清代銀圓述略	邵 雍(203)
清代會票析論	(臺灣)戴學文(220)
四川官方銀行紙幣	向 義(229)
用“禮俗錢”命名代替“厭勝錢”小議	太 系(259)
論民俗錢幣	殷光中(261)
中國壓勝錢的用途分類及圖文識辯	徐鐵城(273)
初析兩張未發行的中國銀行票樣	郁祥楨(297)
《昆明章芹生先生墓表》考叙	錢 嶼(304)
日本侵略中國的鐵證	丁 偉(308)
編後記	(311)

一個勇于開拓中國錢幣學新局面的學者

——紀念彭信威先生和《中國貨幣史》出版 40 周年

馬 飛 海

編者按：中國錢幣學在新中國建立後得到了新生，從舊的錢幣學向新的現代錢幣學轉變。在這一歷史性的轉變過程中，彭信威先生首當其衝，作出了突出的開拓性的貢獻，其功勞是不可磨滅的。1994 年是彭信威先生著作《中國貨幣史》出版 40 年。我們紀念彭信威先生是要認真地向他學習，為建立新的社會主義的中國錢幣學而努力。讓中國錢幣學更好地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為人民服務。為此，我們特地轉載馬飛海撰寫的《一個勇于開拓中國錢幣學新局面的學者——紀念彭信威先生和〈中國貨幣史〉出版 40 周年》（原文發表在《錢幣博覽》1994 年第 4 期）。

—

中國歷代研究錢幣的學者和著錄很多。最早的專著可上推南朝劉氏《錢志》、顧烜《錢譜》，距今已一千五百多年了。宋代學者也

留下許多可貴著作。清代興盛考證之風，錢幣研究更是名家輩出。除圖譜、錢錄、錢幣考外，還有大量錢幣拓片及有關文章、筆記、雜記等問世。舉凡錢幣的形狀、量度、幣材、錢文、圖案、年代、地望、歸屬、版別等，涉及的方面比較多；在資料的積累、整理和考證方面取得較大的成就，真偽的鑒別也有了較多的經驗。在這個基礎上建立和豐富了中國錢幣學這一門獨特的學科。這是歷代錢幣學家的不朽功績。

中國錢幣學的研究對象，長期停留在錢幣的形態上，沒有或沒有更多涉及錢幣的流通領域和各個時期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人民生活以及同世界各國貨幣的聯係和影響等方面。由于時代的局限，當時沒有更多的出土資料，也還不能運用先進的理論和方法進行研究，有些學者的立論往往出于臆斷而謬誤相傳；有些學者考證失于繁瑣，又固于偏見，而不能自拔。因此，在長達一千餘年研究和摸索中進展緩慢。本世紀三、四十年代，留居上海和鄰近地區的一些錢幣學家和收藏家在抗戰前夕和“孤島”的極端困難的情況下，先後成立“中國古泉學會”，出版《古泉學》，成立“中國泉幣學社”，出版《泉幣》，並出版丁福保等編寫的《中國古錢大辭典》和《歷代古錢圖說》。他們有不少創見，做了不少整理和考證的工作，為推動、發展錢幣學作了很大貢獻。可是由于種種原因，這個發展的勢頭沒有保持下去，在抗日戰爭勝利時，却反而中斷了。長期以來，中國錢幣學的研究未能擺脫舊的觀念、框架和路子，嚴重阻礙了學科的發展，而古老錢幣學向新的現代學科的發展也未能完成。

新中國建立后，宣傳馬克思主義，提倡運用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于學術研究工作，提倡理論聯係實際，實事求是，提倡雙百方針，形成了好的學習風氣。同時，大量的古錢幣陸續出土，大量貨幣資料陸續被發掘、整理出來。錢幣工作者也提高了認識，擴大了眼界，努力學習和運用馬克思理論和方法，為古老錢幣學向新的學科的轉變，即把舊的錢幣學發展成為建

立在現代的學科結構(研究對象、目的、任務、範圍等)、方法論和理論體系的基礎上,同多學科相結合,利用現代科學檢驗手段的先進的社會主義錢幣學準備了必要的條件。當然這個轉變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是一個歷史過程,目前這個轉變正在開始,沒有完結。實現這個轉變需要經過很多學者創造性的、艱苦的努力。而在新中國建立以後,彭信威先生就是勇敢地開拓錢幣學研究新領域、新路子、新局面的出色學者。

二

彭信威先生為探索建立新的錢幣學,付出了畢生的辛勤勞動,他的巨著《中國貨幣史》就是一個見證。從宏觀上看,彭信威先生主要的貢獻在于:

(一)提出了中國錢幣學的目的和任務。他認為:“前人所研究的多偏重貨幣的形制。錢幣學家的研究的對象是錢的形狀,錢文的書體,把各代的錢名,像流水帳一樣抄錄下來就算了事,有時連錢的重量和成色都不注意。至于錢的購買力,或為什麼發行某種錢,發行後對於人民生活有什麼影響,對於政治有什麼影響,那是更加不問了。”⁽¹⁾ 這裡,彭信威先生把錢幣購買力、錢幣對於人民生活和政治的影響作為研究錢幣學的一個目的和任務,改變了過去孤立地為研究錢幣而研究的陳舊觀念,開闢了研究領域。

(二)提出了錢幣學和貨幣學研究相結合的創見。他認為:“過去研究錢幣的人,究竟是一些有錢有閑的人,絕大部分是從好玩出發。而且由于時代的限制,沒有近代社會科學的基礎,方法還不是十分縝密。所以近百年來沒有大的進步。而研究貨幣學和貨幣史的人都很少同錢幣學發生接觸,所以成就不大,一定要書本和實物相結合、理論與實際相結合、貨幣學與錢幣學研究相結合,這樣纔能了解真實情況。”⁽²⁾ 這裏,彭信威先生三個相結合的提法,就是要求運用先進的科學的方法研究錢幣學的意思。他并且身體力行,通

過《中國貨幣史》表示他的見解和研究成果。

(三)提出了錢幣學的研究要擴大到流通領域、特別是貨幣購買力的變動的重要觀點。他認為古老錢幣學是對錢幣實物形制的研究。他說：“其實古錢的形制祇是古代貨幣的軀殼，它的生命或靈魂是它的流通情況，尤其是它的購買力。”⁽³⁾這裏，彭信威先生提出的貨幣流通是很大的範圍，包括貨幣流通過程所發生和涉及各個方面的問題，而貨幣購買力更涉及作為貨幣最為本質、最為複雜的貨幣價值問題。弄清這一本質問題，就可以解開諸如私銷私鑄、通貨膨脹和緊縮等一直困惑着歷代統治階級的難題。

(四)提出了嚴肅的治學態度和建立新的學風問題。他認為：“明代的學風很不利于學術發展。也許當時的唯心主義的哲學是一個原因，使一般知識分子養成一種浮誇的態度，研究問題而不聯繫實際，不實事求是，祇是憑空臆說。”⁽⁴⁾對於清初學人，他說：“他們還保留明代理學那種主觀唯心論的治學態度，不重視實物，不實事求是，不嚴肅，不忠實，祇知摹仿抄襲。”⁽⁵⁾對嘉道咸同的學人，他說：“那一班人著書，不是為利，而是從玩好出發，多少帶一點交游應酬性質，所以書中往往互相標榜。”批評他們把“錢幣的出藏、轉手，為他們生活中的大事”。而不注意科學研究方法、邏輯學和知識面的擴大。⁽⁶⁾他甚至還用“捕風捉影”、“任意穿鑿”的詞句批評當時個別錢幣學家。⁽⁷⁾這裏，彭信威先生第一個聯係明清錢幣學的實際，從治學和學風的高度提出發展錢幣學的重大問題。沒有一代好的學風，是很難迅速發展錢幣學的。

(五)彭信威先生尊重真理，尊重事實，對每一事件的過程，每一論點的形成，都要不厭其詳地反復尋找大量事實根據。《中國貨幣史》就是一個資料庫。他還不放棄“注釋”，利用它儲存了豐富的資料和索引，是其他學術著作少見的。人們從這本書及其“注釋”中，獲得許多寶貴的資料，為研究工作提供了方便。

這種尊重真理、尊重事實的精神也表現在他認真嚴肅、一絲不

苟地對待自己的學術研究工作。他于1943年開始撰寫《中國貨幣史》，初稿十幾萬字，1948年和1949年擴充內容，完全重寫，前後化了10年時間，于1954年由群聯出版社出版，字數增至45萬餘字。後又陸續增訂，于1958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重排出了第一版，字數增至近49萬字。以後又日積月累地作一些補充和修改，調整和增加了一些章節。尤其可貴的是，他發現過去觀點有錯誤的，就公開說明改過來。“譬如唐朝的大曆錢和建中錢，以前我認為都是私鑄，現在我認為有官鑄，因為當時情形不利于私鑄。”⁽⁸⁾1965年仍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第二版，全書增加到近77萬字。他一生專心致志地撰寫這一本專著。這本《中國貨幣史》是他追求真理，取得重要學術成果的紀錄，也是中國錢幣學取得具有劃時代意義豐收的紀錄。

三

彭信威先生的創造性的研究工作和《中國貨幣史》的輝煌巨著，給我們什麼啓示呢？歸納到一點，就是要繼續完成上述中國錢幣學從舊的學科向社會主義新的現代學科的轉變。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我認為目前要通過共同的努力，主要解決三個方面的問題：

首先是把錢幣學作為一門現代學科，給予科學的定義和合理的學科結構。《中國錢幣》1990年第3期發起的《關於中國錢幣學理論體系的討論》，其中關於錢幣學和貨幣學或貨幣史的關係的討論引起普遍的注意。這也是彭信威先生首先提出來並加以論述而未及完滿解決的問題。這就是說，中國錢幣學作為一門現代學科，必須解決研究對象、範圍、目的、任務、研究方法等重要問題。

“錢幣”一般指金屬鑄幣，同包括實物貨幣、稱量貨幣和信用貨幣的“貨幣”大概念有所區別。錢幣是貨幣中的一種。過去錢幣著作中也涉及龜貝、實物和紙幣等，但主要的研究對象是金屬鑄幣。錢幣學是古老的學科，貨幣學或貨幣史是近代建立起來的學科，各

有不同的淵源，是兩種不同但有密切聯系的學科。

中國錢幣學在長期歷史中已積累了豐富的成果和經驗。新中國建立後，在錢幣學開始向新學科轉變的過程中，形成了一定的學科結構、專業特長和風格而具有一定的優勢，已不是貨幣史所能完全代替。但是錢幣學向先進的社會主義現代學科的轉變還處于開始階段，其中傳統的非科學性的深厚影響仍是它前進的沉重負擔。如果仍舊墨守成規，照老路子走下去，也難有成就。可以在現有基礎上，吸收先進理論和方法，調整和明確學科結構，適當擴大研究範圍，走同貨幣史相結合的道路，跨上新臺階，並在新基礎上向前發展。

其次，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方法指導錢幣學研究工作。歷代貨幣（包括錢幣）都是一定歷史的產物，無不打上歷史的烙印，也給歷史以一定的影響，起着推動或阻礙歷史前進的作用。因此，研究歷史貨幣要對貨幣進行歷史唯物主義的考察，放在一定歷史條件下，同一定的社會生產力、生產關係和政治、經濟等狀況聯系起來進行分析。彭信威先生正是這樣做的。他雖然沒有提到運用馬克思主義研究錢幣學，也不管他是否意識到，他從研究貨幣的起源開始，搜集大量資料，對歷代貨幣努力進行歷史的、唯物的分析，開了個好的頭，影響了大批人。1982年，中國錢幣學會在成立時即號召把馬克思主義作為研究的指導思想。10餘年過去了，現在努力學習和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和方法從事錢幣研究的人愈來愈多，成果也愈來愈多。但是，這個問題遠未解決。

中國錢幣學當前面臨着向前發展或保守落後這一歷史性的選擇。錢幣學研究者內部新舊兩種觀點和方法的矛盾是存在的，應該承認，傳統的和習慣勢力是不容易改變過來的。這主要不是因為人們主觀上反對馬克思的理論和方法，而是認識還跟不上，何況學會和運用科學理論和方法，也要有一個實踐和適應的過程。因此，這個矛盾是不可避免的，但也是不可怕的，可以逐步解決。至于

有極個別人走過了頭，他們從形而上學、主觀唯心主義出發，隨心所欲地用武斷、臆斷和種種奇談怪論來代替科學論證。這種現象時有發生，雖無多少市場，但仍需多做說服和團結工作，避免錢幣研究工作受到不必要的干擾。

(三)提倡社會主義新學風，發展社會主義錢幣學。好的學風可以說是一種時代的精神、氣魄和作風，將對錢幣學的研究起着有力的促進作用，壞學風則起着阻礙和破壞的作用。舊的學風向新的學風的轉變也是錢幣學向新的學科轉變的先行條件和標志。10多年來，社會上研究錢幣的人多起來了，認真嚴肅和實事求是的研究態度已為多數人所接受。但是，像彭信威先生批評明清學人的諸如浮誇、臆說、摹仿抄襲、互相標榜等缺點，現在仍然存在，有的甚至更為嚴重。要改變這種不良學風，恐怕要花一代甚至兩代人的時間，不是一蹴可成。至于近年來，為追求某種私利，有人竟不惜偽造歷史、制造偽學，有人圍繞着以錢幣“出藏、轉手”為“大事”而製造輿論，大談買賣之道，祇能被稱為市儈學。這種企圖以偽學和市儈學代替錢幣學的傾向，雖非源出于錢幣學界內部，但因這一思潮對當前錢幣學的健康發展帶來嚴重干擾和迅速擴大的負面影響，所以應當堅決抵制，及時澄清。

當前，中國錢幣學研究欣欣向榮，蓬勃發展，勢不可擋。把古老的錢幣學發展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錢幣學是歷史的必然，也是時代賦予的光榮任務。紀念彭信威先生和《中國貨幣史》出版40周年，是為着更好地學習，更好地做好當前工作。這就是做好由彭信威先生開始做的、建立和發展社會主義錢幣學的工作。完成這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任務，必須有與此相適應的或超前的新思想。我相信這個任務通過我們錢幣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一定會在我們這一代或下一代完成。

-
- (1)(2)(3) 《中國貨幣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版，《序言》第 13、23 頁。
(4)(5)(6)(7) 《中國貨幣史》第 738、928、938、533 頁。
(8) 《中國貨幣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再版序》第 2 頁。

建議成立中國集錢文化宣傳監督委員會

朱 活

編者按：朱活先生于1992年7月25日向在北京召開的中國錢幣學會年會提交的《建議成立中國集錢文化宣傳監督委員會》的文件，已成為重要的史料。現徵得朱先生的同意，全文發表，供讀者參考。

中國錢幣學會成立已經10周年了，在改革開放的10年歲月里，中國錢幣研究事業的發展，堪稱飛黃騰達，碩果累累，成績赫然。特別是大力宣傳以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立場、方法研究中國古錢文化，做出了顯著的社會效益。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將有優秀的貢獻。今特為錢幣學會賀，為錢幣文化之繁榮賀！

衆所周知，古錢學是社會科學中的一門多邊緣學科，因此，集錢不能拘泥于“玩錢”與“愛好”。“愛好”與科學之間固然有其聯系性，不愛好是無法搞科學研究的，這是共同性，單憑愛好和熱情是無法從事科學研究的，沒有積累和耐心，是研究不出優秀成果的，研究古錢也不能例外，這是愛好與科學之間的特殊性。

時賢有為“三百萬泉界主流（即‘古錢迷’）”呼籲者，令人無法知

道怎樣估計出“三百萬”的“古錢迷”，有沒有科學性姑且不論，這裏他要求“古錢迷”走向什麼途徑，最值得我科關注。顯然不僅要求三百萬“古錢迷”拘泥于“愛好”，而且要厭惡研究科學的路子，這條路子表面上愛好古錢，是“古錢迷”，實際上是培養大批的“現錢迷”。結果就有為“倒爺”投機倒把而服務的可能，至于時賢宣傳的“評級”、“標價”，實在找不出其中的真實性，如果說那不過是各自所作的估計，那就不是科學的數據，所以它缺乏科學觀，因而沒有科學的集錢觀。這種不正當的現象，就必須監督和抨擊。

自《文物保護法》頒布以來，文物法制建設逐步建立起來，古錢是文物，必然歸納在《文物保護法》之內，絕對不應把集錢放在文物法制之外。如果有人要求集錢在文物法制之外，另立新章，為“倒爺文化”而服務，那是無法辦到的。如果發現這種違法的不良現象，祇有抨擊和監督。

對中青年有關錢幣的論著，應當竭力給以鼓勵，特別是對青年的論著應該多方給予支持。但對沽名釣譽、欺世盜名等“作品”的不良現象，也祇有給以批評。

集錢文化是弘揚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對兩個文明建設服務及“二為”服務方面的典型現象，我們必須大力宣傳教育。

為了推動集錢文化迅速健康發展，因而建議成立中國集錢文化宣傳監督委員會，草此短稿，妥否？願與時賢同行共同研究。

齊魯貨幣考

朱 活

编者按：朱活先生撰寫的《泰山之陰齊幣論》和《泰山之陽魯幣論》是論述和考證齊魯古貨幣的力作，已先後發表在國內刊物上，爲了更廣泛地向讀者介紹這兩篇重要文章，經徵得朱先生同意，將兩篇文章摘要合爲一篇，改名爲《齊魯貨幣考》。

一

《史記·貨殖列傳》：“……泰山之陽則魯，泰山之陰則齊。”太史公曰：“吾適齊，自泰山居之琅邪，北被于北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闕達多匿知，其天性也。以太公之聖，建國本，桓公之盛，修善政，以爲諸侯會盟，稱伯，不亦宜乎？洋洋哉，固大國之風也！”（《史記·齊太公世家》）

以海、濟、淮、河爲四界，以泰山爲中心的這塊大地，的確給我們蘊藏着引以自豪的泰山文化。

古代文獻把遼古生活在東方的先民稱爲東夷。夷者人也，東夷實際上就是遼古生活在東方的人。以泰安大汶口爲代表的大汶口文化，以龍山鎮爲代表的龍山文化，這是代表泰山陰陽東方先民的

文化遺址。

泰安大汶口文化的石器磨製甚精，通體磨光的比例較大，切割法和管鑽法都很普遍，有些石器加以拋光。龍山文化的石器也保持很高的加工水平，有些石器上還刻有複雜的花紋，或鑲嵌松綠石。每一件器物的形制也頗有規格。但是中原地區以仰韶文化為代表到龍山文化的石器，其加工技術是不如東方的。切割法和管鑽法到仰韶文化晚期纔出現，直到龍山文化時代也未能普遍。打製石器自始至終都保持一定的比例。石器既然是當時的主要生產工具，石器製造的優劣及其使用效能直接反映生產力的發展水平。由此可見，當時東方的生產是占領先地位的。

泰安大汶口遺址 10 號和 117 號墓各出土 1 件玉鉞，《大汶口》報告命名為玉鏃，製作是十分精緻的。器表經過精心的磨光而帶有光澤。到了泰山陰陽的龍山文化時期，如日照兩城鎮、安丘堯王城、五蓮丹上、臨朐西朱封等遺址均有玉發現。兩城鎮遺址出上的一件玉鉞製作更為精美，刻着饕餮紋。玉器在中原地區的史前文化中並不發達的，到夏代才開始發展起來。二里頭遺址的第三期內，方發現鉞、戈、圭等較精緻的玉器，顯然受到東夷的影響，這可能是夏與東夷之間有交換關係，確實使我們體會到當時東方的經濟文化較中原發達為早。

泰安大汶口文化的陶器，除有仰韶文化那些陶器和基本一致的發展規律外，還有白陶和青灰細泥陶。龍山文化時代，在東方陶器生產更普遍使用輪製，大大提高了生產效率。大汶口薄胎黑陶出現時，中原地區根本沒有薄胎黑陶，更找不到鏤刻精美的薄胎黑陶。

泰安大汶口第 10 號墓，有木椁，墓主是老年女性。頭部佩帶象牙梳及一串長條形石飾，頸部有一串管狀石飾，胸部有一串松綠石飾，右臂佩玉鐲，手裏握獐牙。其餘殉葬品有象牙雕筒、玉指環、玉斧、石斧、豬頭骨、鰐魚鱗板等。而殉葬陶器總數達 93 件，都是當時